

深读·封面故事



武昌实验小学,少先队的“几道杠”被统一的志愿者标识代替。

抹不去的“几道杠”

文/片 本报记者 龚海

(上接B01版)

少先队是个“出干部”的地方。去年武汉曾出过“五道杠”,“五道杠”少年黄艺博的父亲忙前忙后,带儿子上敬老院,亲自操刀儿子的各种宣传照,联系报社给儿子发表文章,终于将其塑造成“五道杠”政治神童。

一年过去,“五道杠”的影响还在。

武昌实验小学一位三年级学生的家长刘欣对此有过反思,但更觉得自己是迫于无奈,她也很希望儿子在学校能谋得一个班干部职位,即便是志愿者,但“人数有限”,也是提升孩子的重要机会。

儿子是去年转学来到武昌实验小学的,在之前的小学,刘欣最头痛的莫过于恶劣的班干部竞选风气。“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当上班干部,有些家长给我发短信打电话,让我儿子给他孩子投票,有的则教自己的孩子给班里同学买礼物。”

武昌实验小学的情况要好一些,但她有时仍会不自觉地陷入苦恼:“我不去教孩子学会来事儿、机灵点儿,谁知道别的家长会不会那样教自己孩子,那我孩子岂不要吃亏了,你说帮孩子写个竞选稿应该是人之常情吧?”

服务与权力

区别在哪里

孩子们有时并没有揣摩到大人的心思。解下“三道杠”的别针,换上志愿者标识,六年级D班的王思妮还不太明白这种改变意味着什么,她只是觉得这个标识也“挺好看”。但走在校园里,她发现,“低年级的学生不再向她投来曾让她印象深刻的敬畏目光。”这让她有些微微的失落。

但无论在少先队还是班级里,王思妮的工作还和以前一样,作为班长,她上课喊起立,维护班级秩序,行使班里最重要的权力。

想起刚戴上“三道杠”的那一刻,这个比同龄孩子思维更缜密的小姑娘还是激动得有些飘飘然。走出校门口,有学生家长看到她说:“哇,三道杠!”她瞬间就有了一副“小大人”的神情,美滋滋地甩起马尾辫。在她印象里,“三道杠”比班长要“厉害”得多。

优越感就像病毒一样滋生,校长张基广描述了这样的情景,“老师不在教室了,一个学生像模像样地拿根教鞭在巡视教室,还时不时用教鞭在这个同学桌上敲敲,在那个同学头上晃晃,而被敲、被晃的同学都拿一种异样的眼光瞅着他;有时,他站在讲台上,一双眼睛像老鹰一样盯着全班同学,巴不得哪个地方



98名学生当上了志愿者,按照学校的设想,志愿者将覆盖更多学生。



下午,武昌实验小学门口挤满了接学生的家长,少先队“几道杠”取消后,学生将佩戴统一的志愿者标识。

有个风吹草动,他就会马上做出反应,在黑板上得意洋洋地记上一个不守纪律的同学名字,或者大声地喊着‘某某某,你不要讲话’……”

张基广很反感班级和少先队的“官化”,让学校里等级分明的“一道杠”、“二道杠”、“三道杠”变成志愿者,而且在外部标识上不加以区分,在他看来,无疑能直接遏制这种风气,并让孩子们从小培养志愿服务精神。

武昌实验小学少先队志愿者的产生要经过自荐、海选、投票等程序,这无疑是一项创新,虽然同样渗透了成人世界的风格。

武昌实验小学政教处主任徐仲读称,以前少先队干部都是以学习成绩为标准,现在志愿者的评选由学生投票产生,看重的是孩子的特长、责任心、主动服务意识和人际交往能力等。

统一的志愿者标识似乎让这些班干部加队长、队委“混然众人矣”,但志愿者仍然是学校里的稀缺品,也是孩子们争先创优的目标。

王思妮说:“我们有58个班、98个志愿者,实际上每个班才分配了两个左右的名额,最多的也不超

过四个,我们班有三个。我也是经过班级推荐,还做了演讲,最后同学投票才好不容易当上的。”

98个志愿者绝大多数都是班干部和少先队干部,志愿服务的内容还不清晰,戴上志愿者标识,他们仍然脱离不了班队干部的身份。

在孩子们的心中,他们还不能区分“服务”和“权力”有什么根本性区别,很多人仍然向往“稀缺”的志愿者,并乐于听从父母的分析和指导。

徐仲读一再强调,“我们在做些改变,(通过当志愿者)培养孩子们的责任感和服务意识,树立每个孩子都是平等的校园‘小主人’的新观念。”

但改变才刚刚开始。

是全民学生

还是全民“学生官”?

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并不看好武昌实验小学取消“几道杠”的做法,“倡导小学生的志愿服务精神很好,但不能取代少先队的标识,这是两码事。”

孙云晓说,少先队“几道杠”的

本意是“多一道杠是多一道责任,这是服务的岗位,而不是当官的岗位,要反对少先队中官本位的误导,只有强化其服务导向,执行严格的民主程序。”这被他看作解决问题的根本。

但遗憾的是,他调查发现,全国只有59%的少先队干部经由民主选举产生,另一个数据则是全国90%以上的小学生有当班队干部的愿望。

班干部总是少数,于是有学校尝试操作性更强的解决办法。

长沙市一所小学的班主任想出一招,她给班上的61个学生每人都安排了一个岗位,相互有不同的分工,有管理多媒体的、有管理饮水机的、有管理图书的……61个学生61个班干部,一时形成“全民班干”的局面。

虽然班主任一再强调这些职务都是为班集体服务,但在家长眼里,61个干部仍然有大小之别。有家长对图书管理员的职位瞧不上眼,转而让孩子去角逐听起来更有权力的班主任助理,这让班主任不得不考虑给这个“强势”职位限定更加平民化的职责范围。

虽然不像这个班级那样“全民班干”,但武昌实验小学大多数班级的班干部覆盖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,家长没有意识到孩子班里有这么多班干部,那些负责搞卫生的、做解说的、放音乐的,并没有被他们算作班干部。

胡女士说这个孩子做过值日班长,可这太普通了,她不觉得和班干部有半毛钱联系,“最少得是个班级委员,才能拿得出手吧。”

“‘全民班干’是个好的尝试,但也会有问题。”孙云晓说,“在设班干部的时候,我们就要有服务的导向,淡化级别,强调服务和责任,孩子们觉得体育委员好,劳动委员好,而大人却觉得不好,认为只有学习委员、班长、大队委员才好,那是成人的官本位在误导孩子,是成年人的社会问题折射进了儿童世界。”

在这些试图取消校园“官本位”的尝试中,大家都在努力取消成人世界对孩子世界的影响,但也都或多或少保留着成人世界的影子。

按照校长张基广的想法,学校所有的少先队干部都应该由志愿者替代,而且志愿者还要吸纳更多的普通学生,而不是集中在一小撮班干部身上,最好是二年级以上的学生都能成为志愿者,“最好是校园处处都能见到志愿者的身影”。

“即使在校内,去官本位,去功利化也将是个漫长的过程。”校长张基广说,他下定决心,总有一天,要“让教育回家”。

(文中部分受访者化为化名)

武昌实验小学

校长张基广:

“让大人从孩子的世界抽身出来”

本报记者 龚海

成人世界的渗透被不少学者当作孩子们功利化的根源,成人官本位的大环境一时难以改变,但武昌实验小学校长张基广并不想就此裹足不前。

这位戴着细黑边眼镜、说话低声细语的书生校长并不像他外表那样传统和与世无争,他身上带着一股浪漫情怀,总是试图通过各种与现行教育不同的革新措施,让“教育回家,回归孩子们的天性”。

取消“几道杠”只是他诸多革新措施中的一项,而他早就担心外界会对此过分分解和放大。

其实在把“两道杠”、“三道杠”变成志愿者几年前,张基广就施行过班干部轮换制,“让每个同学以班干部的名义为班级轮流贡献自己的力量,这样,就不存在特权,更不会潜在着‘官本位’意识,每个同学都是班级的生活者、参与者、服务者,每个同学都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。”

他觉得教育“在‘功利’、‘近视’和‘喧嚣’的丛林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”,他只能一点一点地通过自己的“做”,和大家一起努力,“让教育回家”,去官本位、去功利化将是个漫长的过程。

在刚刚过去的暑假,他特意找人在校园里修了兔舍,养起兔子和鸟,让校园多一份童趣。开学后,孩子们立刻关注到了学校的新变化,他欣然看到孩子们能在校园里找回这份童真。

之前,学校的土操场一刮风就尘土飞扬,有家长建议换成塑胶场地,张基广不让,他觉得那是属于孩子们的泥土上的幸福。

为迎接省里的绿化评估,搞绿化的专家建议将学校田径场周围的杂树清理掉,这样能绿化得更加美观,他也不许,因为“自然的、原生态的”才符合“自然、从容和本真”的办学理念,学校为此还失去了一块先进的牌匾。

张基广甚至给孩子们减负,主动试验起“无家庭作业班”,在孩子和家长自愿的基础上,这个特殊班级被取消了书面家庭作业,取而代之的是六项素质作业,比如必须学会洗碗、扫地等家务劳动,还要经常看《百家讲坛》等节目……

刚开始,“无家庭作业班”遭遇不少家长的私下“加餐”,但现在,家长们已经适应了孩子放学后无作业、自由支配时间的状态。

“孩子没有数学作业,但因为课堂效率高,他们班的数学成绩没有低于80分的,后来我想,有些家庭作业其实是浪费时间。”一位家长说,自己也从中学会从容,把孩子的学习交给孩子自己去把握。

张基广一如既往的低调,家长越来越多地从张基广的博客中分享到他的教育理念,希望大人从孩子的世界抽身出来,顺其自然,避免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孩子。

“我们有时甚至犯不着去发表意见,就像我们说孩子戴着‘三道杠’好像比别的孩子高人一等,但孩子们原本不这么觉得,反倒是我们说了,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。”家长刘欣说。